

蒙古族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孟和乌力吉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蒙古族现代文学应包括 1900 年前后至 1947 年前后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的所有形式。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阶段。尤其是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是蒙古族现代文学创作与现代社会文化探讨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 蒙古族文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促进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蒙古族现代文学是在继承自己传统文学遗产的同时, 又受到国内外现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以自己独有特点逐渐发展起来的, 即具有民族特点的同时, 也局部具备了普遍的现代性。蒙古族现代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具有复杂联系, 它从文学角度反映了现代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 并形成独特的内在发展规律。本文以较为翔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 运用文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等研究方法, 从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变、文艺思潮的现代性、创作理念的现代性、形象塑造的现代性、社会功效的现代性等五个方面入手, 对蒙古族现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形成动因、特点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 蒙古族; 现代文学; 现代性;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52

文献标识码: A

一、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变

法国社会学家达尼洛·马尔图切利 (Danilo Martuccelli) 认为, 现代性“在其最频繁的用法中, 通常不指别的东西, 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充满不安, 面对现实的关系方式, 这足以表明这种提问在何种程度上与一种历史性质的提问是不可分离的。但是现代性不能归结为现时, 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 或作为眼下的现在; 更确切地说, 现代性是寻求对一种不安的答案。”^[1]蒙古族现代文学在历史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中寻找出路, 寻求一种特定环境中的社会文化变迁之现实答案。这些寻求首先在文学传播方式的转变中得到体现。文学传播方式指文学作品体现其现代性的主要传媒载体形式。其转变具体指在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文学与文化工作者所创办的报刊、出版社和学会的剧增及其与传统文学传播方式所不同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立体效应。从蒙古族社会精英阶层的所作所为来看, 20 世纪初期至 40 年代, 贡桑诺尔布、策楞栋鲁普、赵都宝扎布、特木格图、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布和贺西格、德王、郭日查日扎布等上层人士及知识精英对民族出版事业与文学报刊发展的贡献是最大的。

首先, 简略回顾与文学创作和文化研究有关的报刊业的发展状况。

1902~1949 年之间, 以蒙古文为主的报刊的出版发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这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社会性支撑平台。这一时期发行的报刊在种类、发行量、技术含量、信息量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1902~1905 年, 贡桑诺尔布创办发行的《婴报》宣告了蒙古族现代报刊事业的开始。1905~1909 年以后继续出版发行的《Monggol-vn sonin bichig》是蒙古族现代报刊业的第一次发展高峰。自 20 年代开始, 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也纷纷创办书社、发行报刊, 结成文化社团, 弘扬民族文化, 传播时事知识, 以求振兴图强。从 1925 年开始, 现代意义上的蒙古文报刊蓬勃发展。1925 年 11 月,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创办了《内蒙国民旬刊》(蒙古文)。其办刊宗旨为: “一要保护和发展蒙古人民的生计权益; 二要忠实报导真实情况, 以消除广大人民的糊涂认识; 三

要以扩大人民的自由和提高文化知识等为主。”[2]1930年，内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在南京创办了蒙汉合璧的《蒙古旬刊》，内容分蒙事纪要、时事要闻、党义、法令、常识、蒙文研究、蒙事商榷等栏目，在政界上层和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较大影响。稍后创办的还有，1933年的《蒙古前途》（蒙汉合璧月刊）、1934年的《新蒙古》（月刊）、1935年的《漠声》（Mangha-in hongha）（杂志）、1936年的《醒蒙》（月刊）等。在整个现代时期影响力最为深广的是1936年恢复活动的《丙寅》杂志、1941年以后逐步活跃起来的《新蒙古》杂志以及同期的《青旗》（十日刊）等。这些虽然不是纯文学报刊，但对其文学作品的重视和对文艺理论的关注是难能可贵的，尤其《青旗》十日刊发表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白乙斯古郎、阿润巴图、塔木苏荣、尼玛等诗人的新作，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内蒙古东部和西部地区先后成立了一批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社团，分别编辑发行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出版了有关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书籍。1937年，在长春成立了蒙古会馆，创办了《蒙古新报》、《儿童新闻》，两年后又创办了综合性双月刊《大青旗》。这些都是现代蒙古文学的重要阵地。1941~1945年间创办发行的在日留学生综合杂志《新蒙古》刊登过各种体裁的为数不少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组织发表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女学生集体作品，这是蒙古族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在校学生有关人生价值探索的有组织的文学创作活动。“由在日本生活的蒙古族留学生们组织的‘留日蒙古同乡会’所出版发行的《新蒙古》杂志第二号的现存已被确认，这样，创刊号到第四号均被找到。以赴日留学的青年为主，并由他们自己选题，执笔，编辑的《新蒙古》杂志是具体记录当时留学生价值观、对于蒙古社会的认识、与日本的关系等的珍贵资料。赴日留学的蒙古族留学生们强烈意识到把日本新文化引进蒙古的社会重任，并通过《新蒙古》将这些积极付诸实践，努力试图为蒙古社会发展做出贡献。”[3]

随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蒙古族的报刊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主要有《群众报》（1946年，蒙汉文三日刊）、《内蒙古自治报》（1947年，蒙汉文日刊）、《内蒙古日报》（1948年，蒙文）、《内蒙古周报》（1950年，蒙汉合璧）等。1948年1月，内蒙古自治政府将内蒙古自治报社改称内蒙古日报社，创办了自治政府机关报《内蒙古日报》，发表一些文学作品。之前，《内蒙古自治报》转写刊登蒙古国著名诗人达·纳楚克道尔吉的《我的家乡》等名诗。还刊登苏日雅等人的新诗作品。女诗人哈森格日乐的《只过二十八天的婴儿》、《太阳下的农民》等诗歌则在《群众报》上发表的。

其次，以文学与文化的主要活动人物为切入点，对出版社和学会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策楞栋鲁普和国华书局

1916年~1918年，察哈尔牛羊群总管策楞栋鲁普在张家口主持创办汉蒙翻译国华书局，先后翻译并石印出版了汉蒙文合璧的《国文教科书》、《幼学须知》等启蒙教材。它标志着20世纪蒙古族现代文化教育出版事业正式开始和发展。

（二）特睦格图与蒙文书社

现代文化教育工作者、出版家特睦格图（1888~1937）1906年受贡王派遣，东渡到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学习。他毕业于陆军士官科后又转入东京慈惠医科大学。特睦格图通晓蒙、汉、日三种语言文字，在日本期间，除学习陆军士官和医学技术外，还钻研文学，研究了不少古典名著。1924年，特睦格图蒙文铅字印刷工作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其特点是连接处结构相称，衔接合缝，长短规格相称，制造精细。1924年春季，特睦格图开始成立蒙文书社和蒙文书社印刷厂。从《西汉演义》的蒙译出版发行开始，蒙文书社出版发行了许多历史、教育类书籍，对当时和后来蒙古族文字教育普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蒙文书社曾以蒙藏文翻译出版过《元朝历代帝后像》、《成吉思汗传》、《成吉思汗箴言》、《蒙古黄金史》、《译注蒙古源流》、《金史纪事本末》、《元史》、《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蒙文教科书》、《辞典》、《字典》、《藏经》以及其它图书报刊，版工细致，质量颇好。”[4]与文学有关的故事类书籍也是影响广泛的，其中东部地区蒙古族民众喜爱的本子故事等翻译作品也首次大规模正式出版发行，从而促进了民间本子文学的现代传播。

（三）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和东蒙书局

在蒙古族现代文坛上较有影响力的克星额（1889~1950）、若勒格尔扎布（1889—1941）、拉西僧格等文化工作者于1926年在沈阳成立的东蒙书局也是现代蒙古文学传播的重要平台之一。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本人也是作家，学者，教育家。东蒙书局成立后，若勒格尔扎布等在北京蒙文书社的蒙文铅字基础上，创制了自己的蒙文铅字铜模，并出版了大量的蒙文历史、语言文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初学国文》（蒙文小学教科书）、《蒙古语词典》、《详解蒙古语典》、《蒙汉全璧字典》、《珍宝数珠》等。若勒格尔扎布还翻译出版了《孝经》和《聊斋志异》。其中成立之初出版的《初学国文》是蒙古族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小学蒙古文教科书，该6册小学教科书是若勒格尔扎布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其内容包括了天文、地理、人物、政治、法律、军事等有价值的普通常识，且选入了若勒格尔扎布等人的许多现代特色浓厚的文学作品。其中，《青海湖》、《乌珠穆沁盐湖》、《哈字头连诵》等是当时极其重要的蒙古文学精品。克星额写过《悯农歌》、《前郭尔罗斯旗旅行记》、《成吉思汗颂》、《柏园随笔》、《梅花》、《杂感诗》、《拜活佛》、《寓言》、《四十年日记》、《癸巳年京城之捉诗》、《双合尔寺景观》等文学作品。克星额在其关于条件动词用法的学术论文里较早地提到“文学”（Vdha Johiyal 1943年）一词，并开创了现代蒙古文学理论基本概念的研究。1940年以后，克星额在长春的蒙古文编译院工作，继续了文化与出版事业。

（四）布和贺西格与蒙文学会

对蒙古族现代传媒出版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奈曼旗人布和贺西格（1902~1943）曾在北京政法大学学习。他通晓蒙汉文，还学过英文，学识特别丰富。1927年1月，布和贺西格同呼和巴特尔等7人一起创建了“蒙文学会”，布和贺西格任学会理事长，呼和巴特尔和玛格斯尔任常务理事。该学会在章程里明确规定：“本学会的宗旨是发扬蒙古族传统文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更新思想，启迪民智，为繁荣发展蒙古族文化事业而努力。”^[5]“蒙文学会”成立之后，除了编印出版蒙文书籍外，还组织会员进行学术活动，同时创办了蒙文杂志《丙寅》，由学会的会员撰稿，刊登小说、诗歌、幽默小品和民歌等文艺作品。1936年，停止十年的“蒙文学会”和“丙寅”杂志恢复运作。

该学会先后出版的蒙文书籍有《大元盛世青史演义》、《蒙古秘史》、《蒙古源流》、《一层楼》（尹湛纳希）、《泣红亭》（尹湛纳希）等历史与文学书籍，《新蒙文辞典》等辞书，《日本教育考察日记》等日记式散文作品；《魔豹》、《民间故事集》等民间文学或翻译作品。《丙寅》杂志在现代文学的发表和传播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其中有《六盘山》（赛春嘎）、《戈壁之南青年泪》（贺布西格腾）、《蒙古人就靠福气》（宝音德力格日）、《苦难中挣扎的人》（仁钦浩日劳）、《牧马人》（孟和乌力吉）等多篇文学作品都是蒙古族现代文学里占有重要位置。另外，布和贺西格本人也很有文学和学术造诣，他译成现代蒙古文的《蒙古秘史》，并撰写《日本教育考察日记》、《蒙古源流》序、《丙寅》杂志序以及《写作通信》等历史与纪实文学体裁的作品。他撰写的《日本教育考察日记》是一部篇幅较长的日记式纪实散文。在记录和描述所见所闻的过程中，还不乏抒发感情的短篇和文艺模仿理论的看法等。可谓，20世纪30年代前期难得的综合创作。布和贺西格还依靠社会力量进行集资开办了“蒙古族师范学校”和“蒙古族平民学校”。为蒙古族教育培养了师资力量，同时又开展扫盲识字活动，把他所提出的“把一切学识均用蒙古语传播开来”的著名现代文化主张逐渐付诸实施。布和贺西格通过《丙寅》杂志，招集发表多篇文学作品，并提出“诗歌要有高深内涵”的文艺美学主张。

（五）德王与首席府出版处

在内蒙古西部牧区，现代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出版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37年，郭日查日扎布任校长的呼和浩特蒙古学院在学生文理全面平衡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培养了部分民

族精英。其物理、化学实验等实践课程是蒙古族现代教育重要亮点之一。由德王（1902~1966）主持于1942年初成立的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在女子教育、文学创作、社会启蒙方面做出了贡献。赛春嘎的遗失诗集《我们前进的杵臼声》就是作者在女校任教时完成的。教科书《家庭兴旺之书》也在该期完成的。与此同时，德王在张家口的主席府专门设有出版处，从1939年开始先后出版过蒙古史学、文学、语言等方面的文化图书约30余种，其中包括现代启蒙作家赛春嘎的诗集《心之友》、散文集《沙地，我的故乡》、《蒙古兴盛之声》、译作《心之光》等。该出版处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界众多智者贤人均为清楚，蒙古人忽视了文明是治世安民，持久致富强盛主要动力的原因，因此其辉煌一时的伟业未能坚持下来的。”^[6]蒙古族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与出版事业正是在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的反思与自我批评中起步的。蒙古族现代文学充分利用报刊、出版社等现代传媒工具，全面配合现代正规学校教育和应用学术研究机构的各项活动，与社会各阶层广大读者群众紧密互动，从而达到传播进步启蒙思想，社会现代改良的目的。

二、文艺思潮的现代性

对一个社会来说，思想观念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变迁最为重要的动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蒙古族社会变迁最大动力来自于当时逐渐接受西方近代化思想的部分上层精英。最早在内蒙古地区提倡现代教育，建立新型学校，并培养新一代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是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在其革新思想中，具有中心位置的是因回顾历史而引起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对未来的理性思考而引发的以民族的复兴与强大为目的的民族主义。

作为成吉思汗正统血统后裔的晚清上层精英贡桑诺尔布，其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改革思想在以下谈话里得到体现。他说：“据本人观察，自古以来各族均必须顺应着时代逐渐进化到文化水平上的。譬如，汉族虽说占据中原，气候温和且物产富裕，但是玄元皇帝之前亦是食生肉，穿树叶兽皮也。在几千年的长河之中出现了众多明皇、哲人，著书立说，教育全民，逐步变成现在的文化之族。西欧列强也都经历过原始简单生活，只不过作为君者的亲自率领教育和改良本民族而已。再如，日本是东洋小国，在明皇明治时期他亲自到海外各国观察，回国后学习和模仿西方，改进知识和教育，改造政治制度，发展手工业，最后，未过几十年，变成强国富民，甚至超过偌大的满清帝国，做到并肩西欧诸国。就我们蒙古民族而言，几百年前成吉思汗突然从北方崛起，席卷欧亚，灭亡四十个国家。后元世祖忽必烈获得中国，并做皇帝，过几代，顺帝失陷中原回北方，遂我族开始逐渐落伍，到现在已经是软弱无力，难道与文化教育无关吗？鄙人世代坐享大清俸禄，现在又是个艰难时期，如不进行全民文武教育，从而协助国家，否则心神不会安宁。尤其是我旗蒙汉族杂居，我诸民如不接受知识教育的话，就会落在汉族后面，难道能不受其欺负吗？由于有中间和自私两种原因，因此非建立学校是不可也。旗知诸臣以及旗民细致理解本意并逐步将其落到实处吧。”^[7]在此谈话里民族辉煌历史和成吉思汗成为了复兴民族的原动力。

贡桑诺尔布认为，蒙古族现今的落败完全由轻视教育，与世隔绝，未能掌握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而引起的。因此，民族要强盛，必须从教育入手，普及现代教育，启蒙民众，解开思想桎梏。具体行动和措施则是建立新型学校，开办新型杂志，引进国外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外国教师，男女同校共学。特睦格图等人后来到日本留学，并进一步发展贡王革新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仍然是教育的现代改革与普及问题。正如特睦格图所提出的“要改变蒙古地区十有八者不识字现象，首先除了普及教育之外别无他法。”^[8]在现代民族教育实践中，贡桑诺尔布的革新思想与复兴决心逐步贯彻实施。虽说贡桑诺尔布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直接影响（其实其本人也是诗人）不是很大的，但是间接影响，包括对文学思想、教育理念和社会革新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认为，蒙古族现代文学发端的社会与思想基础之一来自于贡桑诺尔布的革新思想和复兴努力。

从文学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文学是现实世界和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映，是现实社会文化的艺术化再现形式。文学的产生、发展、变迁和衰落均受现实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的全面影响，即社会环境

是文学生存和延续的重要基础条件，社会历史环境发生变化时文学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动力主要决定文学现象和规律。但同时文学作品也不是纯粹被动地存在，而是它对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也起相应的反馈作用，在某种时空条件下，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和社会环境是一种互动共存关系，社会对文学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文学也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蒙古族现代文学也不例外。

首先，围绕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关系与互动而展开的较大规模的文化进化讨论开阔了多数文化工作者的理论视野和思路。著名学者胡适曾提出“活文学”和“死文学”的概念。“活”对应的是发展、变化、开放和启蒙；而“死”对应的则是停滞、静止、封闭和愚昧。围绕开放与封闭、拿来与改造的关系，蒙古族现代作家们通过散文创作来进行自由争论。文学作品的生活化、社会化、大众化问题受到广泛重视。文学革新思想的基本依据是基于进化论的社会历史多线进步观念。此观点尤其在赛春嘎 1941 年和 1944 年分别正式出版的《沙地，我的故乡》、《蒙古兴盛之声》两部散文著作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他早在张北青年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写《如何甩掉耻辱》、《致力于掌握知识和技能》、《自然世界与人生世界》、《文化与生活》、《书与人》、《以开放为贵》、《何为人》等 7 篇文化散文，并到日本之后修改发表。《文化与生活》里说：“如果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有了发展，那么这个地方的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必须随之发展，所以说文化教育是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动力。”^[9]赛春嘎论证文学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能帮助提高当地的经济生活，即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赛春嘎进一步认为，“脱离经济生活的文明和文化就像从大地被拔断根系的大树一样脆弱无助”，即在说明，文化不能离开其诞生的社会土壤和生活根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存续。

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也展开了讨论。哈达是一位激进的现代散文作家。他写了多篇杂文，并指出蒙古民族的落败主要与未重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有关。甚至认为游牧民族所积累物质文化底子不厚实，他说：“养活游牧人的就是草场，因此一切思索均在这里。从事的活儿、使用的工具都为简单轻巧，拾牛粪木柴的篓子筐子、割草锯木的镰刀斧头、用于迁徙游牧的勒勒车、扫雪除水的铁锹木锹等少数而已。”^[10]进而呼吁“科学，学习科学吧！”。哈达的观点是要在引进和拿来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积极改造和提升自己原有文化。另一位散文作家宝音德力格尔更是直接批评蒙古族人所依赖的精神支柱之一“福气”，提出只有靠自己劳动双手，才会有富裕幸福的生活的务实观点。其散文《蒙古人就靠福气》曾在 1936—1939 年间进行的有奖作品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在说明该作家在文笔能力和批判精神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赛春嘎的观点和主张则相对来讲理性而温和的。他认为，发展文化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学习上，还要必须去付诸实践。赛春嘎指出：“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双手和体力去创造自己的新文化”^[11]，并“无须为过去感伤，而应努力创造未来，应该以创造未来的雄心壮志，冲散过去的那种蒙昧乌云……”^[12]，“要继承已有的传统文化生活并提升已有的传统文化生活。”^[13]这些论述在说明，赛春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就已形成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和改进观点为中心的现代启蒙思想。

先进知识分子对民族人口的减少，疾病的蔓延，家庭的和睦延续等都展开了探讨，危机意识进一步增强。赛春嘎曾说，“我族越来越面临着各种危机。”对人口减少、愚昧封闭等问题的讨论在说明现代文人们逐渐关注到现代社会环境变迁中的生存与民生等基本社会问题，并为其民族致富强盛主张做实证支撑，也成为了创作理念与文论思想的深层基础和现实拓展。

其次，“反封、反帝、反感旧文化道德，推广新文化道德、爱国、爱民族、解放个体等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激发了这个时期文学、诗歌的灵感。”^[14]这个时期的文人作家在思想上，广泛接受了从日本引进来的西方近代民主、博爱、民族、开放、发展、个性解放等概念及其解释。文人作家们在使用和传播这些名词概念的过程中，从蒙古族固有的游牧文化心理吸收营养，使现代民族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特色，如：

（一）传统民间故事英雄人物和智者主题、近代民歌和东部农区蒙古族长篇章回小说中悲剧性人物的描写逐步被以开放理念和批判精神为重要特点的草根农牧民阶层普通人物普世生活的描写所取代；

（二）文学作品的主题、形象、语言、风格等都发生了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变化。赛春嘎曾说：引进外国文化的同时，“必须以自己的智慧、双手和体力去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小说家额尔德木特古斯的大部分现代小说主要题材和中心人物形象都来自于当地农牧民普通生活变迁和心灵世界。他的中、短篇小说对内蒙古东部半农半牧地区农牧民思想、知识、观念的局部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该时期文学思潮所蕴含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民族、民众”，即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现代政法和教育体系；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要强调民族精神和自我意识；在经济生活层面上要进行关注基层民众现实生活，积极建设故乡，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致富梦想。赛春嘎的长诗《故乡》则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和追求。

再次，蒙古族文人作家的知识面得到拓展，文学视野趋于宽阔，在比较和反思中民族文学进一步发展。1913年刊行的《蒙文大同报》里曾写：“作为蒙古人，如不识蒙古文字，是个莫大的耻辱。”^[15]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等编写，并于1926年出版的《初学国文》里出现的“启发”或“开放”（Sengheregulun nehegdegulhui）一词及“平等”（Adali tegshi）、“和约”（Neileguihu gere）、“共和国”（Eb hamtv vlvs）等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蒙古语新概念。知识的更新成为了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动力。上面提到的《初学国文》就开始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提倡和普及，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课程中入选“地球”、“物种”、“物象”、“石炭”、“机器”、“大脑”^[16]等自然科学新词语概念。在社会意识层面上，1935年3月31日出版发行的《蒙古向导》月刊社论栏目发表《重视消除蒙古人的迷信》^[17]等论说文，批评“历代皇帝利用宗教愚昧蒙古族民众”，强调“宗教信仰的个体自由”精神。综合以上科学和人文论述，1936年，布和贺西格提出“一切学识要用蒙古语传播开来”的著名论断。1940年代的《丙寅》杂志和《新蒙古》杂志更是广泛介绍蒙古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发表《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等文章，介绍新制度与新社会生活。这些在说明，蒙古族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不只是关注国内或族内特殊社会问题，还在关注和参考国际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及科学知识问题，在比较观察中文学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蒙古族现代文学在反思与革新大环境的推动下，以文人创作、蒙古语创作、蒙古族民众现实生活的创作为三个基本支撑点而形成的。

最后，文学作品对草根阶层的重视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程度是随着社会变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20世纪前20年里，许多蒙古族文人作家所沿用的主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和人伦礼仪思想传统。1926年由北京蒙文书社刊印的《蒙文分类词典》在“政类”部分里排列和蒙译的词有“政、教、化、福、威、劝、惩、权、纲、道、常、法、严、令、礼、乐”^[18]等。这在说明，当时特睦格图等人的思想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礼仪思想色彩还很浓厚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文人作家除了关注草根大众精神状况、个体自由与人性之外，其现代文学理念也体现于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生存哲理之上。其体现的历史连续性和超越性值得关注。

在此比较一下近代作家尹湛纳希和现代作家克兴额关于对蒙古族农民阶层的关注。“尹湛纳希中年以后对贫苦农民的生活有较深切体会，深感到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和地主阶级的贪婪，对农民寄以同情。”^[19]这在长诗《悯农歌》中有体现。克兴额也写过《悯农歌》，但更为强调“收租者要知道基层农民的痛苦”^[20]，即更为注重民众生存环境和社会矛盾的问题。又如，20世纪初期宗教文学作家丹金旺吉拉在其著名教谕诗《公尼召活佛伊希丹金旺吉拉训谕诗》里较为强烈地批判封建黑与黄上层的生活及精神的腐朽堕落，希望强化宗教教规，净化人的心灵。“丹金旺吉拉出身贵族，又是活佛，他能站在被剥削阶级的一边，鞭挞残暴的权贵，同情苦难的人民，实属难得，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21]但是与30年后写的伏陵嘎小说《咒语之水》的批判讽刺精神相比在深度、广度和民众生活色彩之上相差甚远。《咒语之水》通过描写平民生活，展示牧区蒙古族老大娘过祝寿节时，由于来者过多，非凡热闹，因此，过渡疲劳而离开人世的悲剧，对蒙古人已经变形的黄教信仰进行了艺术性批判。文章在思想和艺术上均获得成功。这很好地说明了文学所关注的现代社会环

境的大变迁。赛春嘎的日记体散文《沙地，我的故乡》所反映和强调的是沙地草原普通草根牧民日常牧业生活及社会思想的自封闭塞状态。对醉汉萨氏的批评、对烟鬼包昆都的惋惜以及普通牧人——自己母亲的深厚感情和崇敬等均体现了作者的大众化草根文学精神。《蒙古兴盛之声》里对女校女孩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体现了作者男女平等、尊重个体生命的现代精神。散文《落入泉水的花之声》里描写的是受封建落后婚姻观念，失去恋爱自由的清纯女孩心理过程，通过对受害者的同情，对“病态人世”进行了强烈批判。额尔德木巴特尔创作的小说“戈壁沙地之花”则描写留学出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与戈壁沙地的普通牧民女孩之间的恋爱故事。虽然，最终这个美好的爱情被严酷的大自然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压垮，成为悲剧，但她却是一朵“明年栽培之后再次开花结果”^[22]的生命礼花。作者通过对爱情悲剧的描摹，突出不管年轻知识分子，还是草原牧羊姑娘，都是为政治社会普世价值和民族独立强盛理想而放弃个体幸福和爱情的非凡精神，思考人生普世意义和生活循环之间平衡的哲理。

总之，在蒙古族现代文学发展的近半个世纪内，多层复合的民本理性思想和民族强盛理念进一步纵向深化，并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从而使对文学及其本质和范围的认识得到提高。在政治层面上民主、民生、民众等强调草根的倾向进一步扩展。赛春嘎的《蒙古兴盛之声》所反映和强调的是苏尼特戈壁草原地带成立的女子学校女孩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人际关系及更为深层的自由、平等、人性等普世价值理念。在经济思想概念上，发展和致富的理念逐步落实，如布和贺西格等文化人士所提倡，并从英语里引进的“Yehe Nemehu”（Economic）、“Sailoo”（Cell）等新词的规范、解释和推广是个重要的证明。在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方面，提倡社会文明和进步、男女平等、扫除文盲和无知、拯救民族等实际行动广泛展开。赛春嘎等作家常用的名词术语里有从日语引进并译成蒙古语的“Soyol Gegerel”（文明）、“Arad Vgsagatan”（民族）、“Talbigdan Nehegegdegulhui”（开放）、“Hogjihui”（发展）、“Soyogoliin Yirtinchu”（文化世界）等。多层复合的民本强盛理念与多层立体社会变迁在互动中获得共生，并对现代作家队伍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报刊出版、文学学会与个体作者构成书面文学三位一体的架势，相辅相成，成为蒙古族现代文学核心阵地。

在以上社会思想变革和文学自身革新的作用下，20世纪30、40年代蒙古族现代书面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活跃于文坛的主要作家有赛春嘎（察哈尔人，日本留学，散文家，诗人）、哈达（呼伦贝尔盟伊敏苏木人，乌格鲁特氏，日本留学，杂文家）、额尔德木巴特尔（曾在日本从事教学工作，小说家）、阿拉巴金（日本留学，杂文作家）、额尔德木特古斯（喀喇沁人，多产小说家）、仁钦浩日劳（库伦旗人，小说家）、哈丰阿（科尔沁人，戏剧和散文作家，政治活动家）、白乙斯古郎（察哈尔人，诗人）等。该时期代表性现代诗歌有《压在篱笆下的幼草》、《窗》、《循环》、《沙海之里》、《星群》、《家》、《故乡》等。代表性小说有《戈壁沙地之花》、《苦难中挣扎者故事》、《现代青年》、《落入泉水的花之声》、《咒语之水》等。戏剧作品有《英雄铁木真》、《梦醒啊》、《酒》等。主要散文有《森林中的小鸟生活》、《蒙古人就靠福气》、《阿拉坦昂阿》、《落入泉水的花之声》、《文明与经济生活》以及赛春嘎相关日记式文学作品等。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数量众多并间接而艺术化地讽刺现实社会问题及人性劣根的现代式书面民间故事，是该期文学舞台的重要特点之一。

开放交流，学习新近，教育启蒙是现代文学工作者最为重要的创作动机和理念。文章内容则涉及到强调个性化的中心人物形象的描摹，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个体主观情感，从而充满了时代激情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思考。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许多蒙古族作家把文学作品当作启蒙教育和拯救民族的重要现实武器，并呼唤民族灵魂，全面投入民族启蒙的现实社会事业。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一方面直接面对大环境多样化的读者群众，进行体裁或类型的多样化调整；另一方面，许多文学作品也逐步变成单一思想或知识的传播工具，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影响经典作品的诞生。可以说，以社会现实问题和教育启蒙为主的蒙古族现代群众通俗文学活动全面展开。

蒙古族现代文学思想变革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来自于翻译事业的发展。在与中原现代社会思想和日本现代科学教育接触的过程中蒙古族知识分子首先开展广泛的翻译工作，大量翻译了异国异族科

学教育思想著作。其中，日译蒙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翻译过程中逐渐进行创作，以先进科学教育和民族强盛为创作的动力和内容。在翻译作品层次上，历史文化著作到思想革新著作，再到科学教育和民族复兴著作。文学作品的创作也是以如此顺序而展开的。

蒙古族现代文学具有思想领域独特的现代特征。其中，开放的文学创作理念和“民族”概念为主线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所反映的地域社会现象和问题则具有了现实性与批判性特点。文学主题和体裁具有了多样化与丰富化特点，且作家到读者的全面互动模式应用与现代意义上的中心人物艺术塑造十分突出。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产生和成熟离不开现代作家群体的迅速形成，更不能离开现代作家们所持的民族启蒙思想、进步教育理念和他们采取的社会行动。出版行业的投入、教育战线的参与和大量文章的发表就是其具体活动体现。

三、创作理念的现代性

蒙古族作家现代风格形成的一个动力是由传统思想观念转变过来的文学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文学作品及创作行为的规范。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提炼文艺理论性的观点主张，用文艺理论论述来概括和解析现代文学作品，最终提出以现代式文艺理论为主轴的理性结论。

蒙古族现代文学发展时期是蒙古族传统的经济生产、社会文化、行为方式、思维信仰均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这种转变是在时间上是逐步加速的；空间上则是逐步扩展，并成为全局而深层的变迁。可以认为，1900年至1926年是相对缓慢的演变时期；1927年至1936年为相对较快的演变时期；1937年至1945年是加速时期；1945年至1949年是最为迅速的演变时期。从文学角度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的黄金时期。期间，文学创作的规范与指导力量——蒙古族现代文艺理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此，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文艺本身的发展规律，将现代蒙古文论可分为三个发展演变阶段，即1900~1926年、1927~1936年、1937~1947年。这种时空格局的文论把握，将能为循序渐进地描述和细致入微地分析该期蒙古文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思路和技术框架，也许会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分析思路与研究模式。文学是文化、教育、知识、思想与环境的重要载体。文论是对作家文学作品和文艺规律性现象的认识与概括。蒙古族现代文学及其宏观调控者之一现代文论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变迁大环境和通俗文学活动小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该期文学工作者非常活跃，文学精品也较多，且由于受到传统游牧文化心理和文艺研究方法的影响，大部分作家倾向于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地夹杂着文学观点和文艺主张，因此，该期蒙古文论的整理和总结不可能绕开作家文学作品而只谈纯粹的现代理性文论。现代特征较为浓厚的文艺理论、观点和主张指导作家文学实践的同时，作家文学实践也在产生和提炼着核心的民族文艺理论。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也趋于多样化、科学化、具体化。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文人作家在沿用包括尹湛纳希在内的近代文人作家的历史社会综合研究方法和印象感受式研究方法，并坚持在近代书面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基础上，更为强调运用多样化的文学研究方法，即站在一定的哲学和文艺美学的高度，观察文学现象和规律，讨论经济基础与文学等上层建筑的关系、探讨文学类型与体裁，关注文学的社会认识与教育作用，强调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蒙古族现代文艺理论思想自身的独特性和规律性。这包括“从第一层面的传统性、平面性、继承性特征到第二层面的过渡性、宽泛性、探索性特征，再到第三层面的现代性、立体性、选择性的动态复合过程。”^[23]这些特殊要素交叉重叠，并构成该期以文艺理论阐述和文学教育实践为中心的文论本体规律性特征。可以说，蒙古族现代文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和扩充，扎实地建构起来，并自成体系。蒙古族现代文人对文学本质、特征、功能、类型和传承等进行独到的研究，并得出民族特点浓厚的结论，譬如，特睦格图的“排忧解难”之说、罗布桑却丹的“歌词反映地域风俗”、“引导至好，文格纯净”之说、赛春嘎的“记录笑声和泪水”之说、站在接受者立场的“文章虽为浅显，但仍望其贡献于民众”观点和“继承既有的，并提升既有的”文化与文学传承观、布和贺西格的“文理结合”观和“让人学会喜爱文学”观、囊日布的“按照客观事物的本真写文章”主张以及德钦的“虚构之气”(Johiyahv Amishvl)看法等等。除此之外，“Gvwa Vran Vyangga、Vran Vdhalal、Vdha Vran、Vdha Vyangga、Vran Johiyal、Vyangga Jvhiyal、Shine Shilug”等对文学基本名词概念的解释与概括都具自己特

色。这些也是蒙古族文学理论所体现的现代性特征之一。总体而言，该时期文学理论主流观点是赛春嘎提出的“文章虽浅显，但仍望其贡献于民众”主张、布和贺西格的“文理结合”观和囊日布的“按照客观事物的本真写文章”。这在客观上恰恰体现着现代文人作家在社会文化变迁时期所持的现实启蒙精神和新文化建构诉求。

在这场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思想争论的结果，多数现代作家旗帜鲜明地站在拿来和改进的一侧，以民生、教育、强盛为具体奋斗目标。其理论依据来自于西方现代社会进化论观点，当然在具体做法上，多数作家强调谨慎思考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以自己传统为基石，强调文学作品的真实反映生活的性质，并重拿来和消化，这样既达到了启蒙进步的目的，又传承发扬了蒙古族传统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在此时期，蒙古文人逐步掌握抽象研究方法，开始解释和定义文学艺术及相关专业概念。这在象征着主导过去几个世纪的浑圆思维开始转向到抽象理论思维，文学理论研究逐渐具备科学特点。”[24]蒙古族现代文学创作理念在开放的社会环境变迁中，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和建构，逐步形成独立的民族文艺理论体系。并且受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文化和现代科技文化的影响，文学理论、文学教育和新文化建构思想逐渐融为一体，成为整体性、开放性和现实性较强的民族文化理论。

四、形象塑造的现代性

文学作品一般通过个性化的，具有一定想象力的形象来反映和塑造社会环境与生活。“笛卡儿对艺术想象创造的美人鱼表示否认，认为这不能称之为艺术；艺术应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不完全是虚构的产物。另一个理性主义者柏斯卡尔则把理智和想象对立起来，认为想象是一切谬误和虚幻的根源。”[25]现代作家在形象塑造中未排斥想象力的作用，但更为强调笛卡尔所说的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或忠实于现实生活。一般认为，文学作品中呈现的具体感性的，具有艺术概括性的，体现作家审美理念和审美想象的自然的和人生的图画成为文学形象。“艺术和实际人生之中本来要有一种‘距离’，所以免不了形式化，免不了几分不自然。演戏用歌唱的声调，雕刻用抽象化的人体，图画改变人物的本来面目，诗用音韵，都是因为这个道理。近代技巧的进步逐渐使艺术逼近实在和自然，这在艺术上不一定是进步。”[26]文学形象主要依靠语言的运用，因此它既有想象的因素，也有间接的信息传达的因素。文学形象是与人的知、情、意的精神结构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其一般形态可分为写实性形象、抒情性形象和表意性形象三种，最高形式艺术止境形态则由文学典型、文学意境和象征构成，是复合立体的表现形态。它还包括生动性、美感性和倾向性等特点。

与传统不同的是，蒙古族现代作家运用有限理性重新发现了新的“个体”，以个人作为文化价值的主体，使“人”的启蒙成为文化启蒙的最终旨趣。他们在散文创作中十分强调将个体的个性与共同体的民族性相结合，并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真美善的，虽有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个体需求应得满足。努力于使文学的境界与人生的境界形成互动交融关系。对“个体”的关注使个人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新的认可。

赛春嘎作品里的人物多为社会上弱势群体一员，小草、幼花、女学生、穷人、老年人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其散文、诗歌作品中。尤其在日记式散文中塑造的“母亲”、杂文集里形容的“落入泉水的年轻美女”及以女子学校女孩为主而塑造的形象里均包含作者同情、理解之情，也不乏对造成不公平的根源——社会问题的批评和鞭挞的声音，因而具有多重复合特点，是审美和思想高度结合的具体表现。哈达塑造的“森林中的小鸟”则是封闭而黑暗环境中胆怯、压抑或找不到出路的迷惑者形象，也是作者对现实环境独有看法的生动而艺术化体现。哈达后来主要写杂文，把自己社会革新，民族振兴理念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额尔德木巴特尔曾在日本从事教学工作，写过一篇成功的短篇小说，其小说中塑造的其木德玛的形象是正面却悲剧性的。其木德玛是草原牧区富有民族文化振兴意识的女孩，是进步民众的形象。她的形象有血有肉，有情有意，是活生生的草原女孩，因此也是成功塑造的个体层面上的审美艺术形象。除此之外，小说中描写的自然界是有声有音，富有生命哲理的动态复合形象，与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相辅相成的。“人化的自然才同人构成审美、艺术关系。”[27]

额尔德木特古斯是另一位成功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塑造的人物形象之多，在蒙古族现代文学里应属独一无二的。其中，1942年前后在《青旗报》上连载的“现代青年人”是蒙古族现代文学首篇中篇小说。文中塑造了“现代青年人”优秀代表巴特尔、其达拉图等正面人物的形象，同时又穿插塑造乌力吉图、王兰等反面落后人物的形象。作者以感人肺腑的典型事件，用饱含激情的笔墨，塑造具有真情实感的艺术形象。额尔德木特古斯小说中描写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都来自于内蒙古东部喀喇沁蒙古族社会文化区域，塑造的人物形象里多带有蒙古族基层农民生活、语言、行为和思想感情，同时也关注部分社会精英人士的思想、社会行为的时代性转变。通过描写和比较中心人物的反差形象，巧妙生动地表达了作者革新进取的现代启蒙思考。额尔德木特古斯的小说另一个主题是通过草根农民形象的塑造，反映农区蒙古族经济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生活破产和文化语言的汉化趋势。《土民》、《离别》、《夜晚》等小说多带微妙的笔调，间接批评当地居民语言文化逐渐丧失的社会现象。仁钦浩日劳在其中篇小说《苦难中挣扎者的故事》中塑造的照日格图和其达拉图两个人的形象也是在反差比较中得到体现。作者批评“不管孩子的愿意或不愿意，故意使其做喇嘛”[28]的现象，提出“教育孩子要顺应其性情”[28]的观点。伏陵嘎发表于《蒙古新报》的小说《咒语之水》则是通过更为艺术化的语言和形象化的人物，批判黄教对蒙古族民众的负面影响，呼唤民众摆脱宗教束缚，破除愚昧，健康生活。

在诗歌方面，阿润巴图的新诗《沙漠之中》是运用有限的文字，自由的诗行和情境素描，塑造了失去动态生命力和前进动力的沙漠牧马人，影射出偏僻封闭环境所带来的停滞与萧条，从而在内心呼唤开放和生机，是一首现代派意象诗歌。浩木格的新诗《家》所塑造的是另一种民族层面上“家”，从而使单一人物形象塑造提升到复杂多变的社会层面。另外，民间故事式的散文作品也通过塑造一些讽刺挖苦味道浓厚的人物形象，批评社会及人的弊端，与正规书面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并驾齐驱。

总之，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围绕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走出了传统文学平面人物形象的困境。在具备人物形象具体性、生动性、倾向性和美感性等特点的基础上，塑造了写实、抒情和表意三层形象，谱写了动态个性形象塑造的新篇章。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立体多面的时代形象，是现代作家们将其社会人生理想与艺术审美追求高度相结合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该期文学形象塑造具有现代性的同时，又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传统英雄主义色彩，即把游牧民族传统的人地关系思想、人生哲学与价值理念、热爱故乡和民族自豪感、动态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特征等均融入于现代文学作品形象塑造中。这些艺术形象与启蒙、开放、振兴、拿来、改造、个性、民主、民族、民众等现代概念和革新主张相结合，逐渐成为了蒙古族现代文学形象的多重复合特征。

五、社会功效的现代性

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文学积极承担了文化启蒙的重任，这容易导致文学社会审美作用的功利化或工具化。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按照传统的说法主要指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娱乐作用。所谓的“寓教于乐”就是指文学艺术作品的一般性社会功效或审美复合作用。一种作品只有很好地发挥了美感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的特点之一是通过艺术形象和审美语言去感染读者，影响读者。作家要选择激动人心的典型形象或故事素材，再用形象化的艺术语言使读者深受艺术感染，并在艺术欣赏中获得情感的升华和审美领悟。蒙古族现代文学体裁里，诗歌、散文尤为起到了文学审美感染作用和社会文化启蒙教育作用。现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赛春嘎的首部正式出版作品，也是蒙古族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集《心侣集》（诗集）、《沙地，我的故乡》（散文集）均以较为自由的诗歌与散文文体实践了文学审美感染作用和社会教化作用。在此，主要探讨现代文学教育功效、多样功效和实用功效等三个方面。

（一）蒙古族现代文学社会功效聚焦点之一是文学作品逐步趋于教育化。

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是以文字为传播载体的，其中在校学生是掌握文字武器的主力。因此文化工作者针对在校学生的文学教育作品和学生自己主动创作的教育诗歌均比较活跃。当然，这种现象

除了受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变迁影响之外，还关系到历史沉淀的因素。在蒙古高原地区，存续于明末及整个清朝时期的佛教寺院学校对蒙古族传统教育产生了复合影响。清代对八旗蒙古设“蒙古官学”，招收蒙古族高层和文武官员子弟，教授满、蒙、汉文及儒家经典。另有条件的地方兴办了私塾。大多数学校以蒙汉或满蒙汉合璧的《三字经》等作为教材。这些学校传播的则是儒家伦理相关常识和佛教理论知识以及蒙古族传统的本土知识、文化、民间文学作品等。到清末，贡桑诺尔布为实行新政，在本旗创办武学堂和男、女学堂，并向内地学堂选送就读生，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使其逐渐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本民族专门人才。这些新型学校是蒙古族现代教育体系基石和开始，尤其为后来蒙古族女子学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是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复合实践的初步尝试。

随着现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尤其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族语文教材的编写，蒙古语现代文学逐渐得到发展。1926年出版的《初学国文》小学教科书序里开宗明义地写出，“由于以启发国民知识智能为目的，因此阐述了尊崇知识道德、爱国、维护民族、积累财富等具体事情与课程。本书课程内容包括天文、地理、人情等常识以及政治、法律、军事等所有国民应该知道的东西，可以说无所不包。国民小学是不分男女，因此本书也收纳了女孩教育的课程，以便男女共同学习。”^[29]该教科书里收入的多篇旅行文学和散文作品在说明，蒙古族文学逐步以教育启蒙为重要目的，为民族的现代化和强盛做铺垫。其中的《蒙古包》、《青海湖》、《乌珠穆沁盐湖》等作品，虽说篇幅不长，但是描写的内容、表达的思想和文学笔调以及传播的科学知识已经与传统文学作品很不一样了。与此同时，在整个20世纪前半叶，许多东部蒙古族各级学校在校学生的教育式诗歌作品相当活跃。像《收音机》（1942年）、《努力学习》（1942年）、《劝告大家的一首诗》（1942年）等一样的诗歌是相当普遍。在西部草原，1937年在呼和浩特成立的民族特色和科学特色浓厚的蒙古学院、1942年德王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草原女校——“苏尼特右旗家政女子学校”的教育进取理念的影响是深远的。女子学校学生积极地、有组织地参加文学创作活动，旨在传播革新思想和科学知识。在女校担任教师的赛春嘎曾写许多教育诗歌。其中，遗失诗集《我们前进中的杵臼声》实际上就是一本典型的提倡热爱故乡和发扬进取精神的现代文学教育作品。从而可以认为，20世纪前50年是蒙古族现代学校文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并促进了现代民族文学的繁荣。

（二）文学作品逐渐趋于多样化。

变迁中的社会则是需要多层次的，多样化的文学作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学作品内容的丰富多彩，表现形式上千差万别，体裁方面更是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传统四分法的作品全面诞生的同时，小说中还大量出现了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体裁和风格各异的诗歌、散文以及民间书面故事更是汗牛充栋。文学作品内容和体裁的多样化在说明，现代作家注重大众化和通俗化，满足各层读者不同的社会审美需求，从而使现代民族文学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对民主的真诚呼唤和民族的强盛诉求使落伍的民族探索了现代文明的广阔道路。文学界里出现了知识分子的作家文学和在校生的民生文学两大流派似的现象。克星额、若勒格尔扎布、布和贺西格、宝音德力格尔、仁钦浩日劳、额尔德木巴特尔等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积极运用蒙古文进行文学创作，在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之间扮演领军人物的角色。赛春嘎、哈达、额尔德木特古斯、金良等则扮演了知识分子和现代优秀学生作家的双重角色。寻觅民族发展出路，探索维护弱小个体生命，人生意义、个体尊严、价值追求等逐步成为了文学现实创作的内在动力。这些客观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作家文学。

（三）文学作品趋于实用化。

该期文学思想主要涉及到启蒙与教育、继承与革新、民主与民生、拯救与强盛等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尽量强调“寓教于乐”的文学创作原则，以布和贺西格的话来说“诗歌要有内涵的哲理和语言的哲理”^[30]，并在独特情节和生动形象中融汇教育和启蒙理念。赛春嘎提出的“文章虽为浅显，但仍望其贡献于民众”主张和“使人向上提升”目标^[31]则是该时期文艺创作活动的核心理念之一。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许多都是现实社会问题或者历史文化问题，作者们竭尽全力寻找解决途径。民本思想是指当时大部分现代作家所持的关心民众，投入基层，强调草根，启蒙强盛的行动理

念。对一位作家来说，他没有更多的可利用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实施自己的社会理念，最主要的方式也只不过是写文章、发表文章来呼唤革新，提倡强盛。在这样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许多蒙古族作家把文学作品当作启蒙教育和拯救民族的重要的现实武器，并全面投入民族启蒙的现实事业。正因为如此，文学作品一方面面对大环境多样化的读者群众，进行体裁或类型的多样化调整。但在另一方面，许多文学作品也逐步变成单一思想知识的传播工具，这样，很大程度上降低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内涵，影响了经典作品的诞生。

由于传统书面文学作品主要受控于社会上层文人和权力集团，广大中下层民众又受到教育和学习现实环境的限制，大部分人是目不识丁，社会发言权主要握在上层手里。当然在广大民众当中民间文学得到广泛传播，成为其满足精神需求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其学校教育的现代转型与农业或工业民族有所不同。但是现代文学的主要形式特征之一就是文字和传媒为载体的作家文学的崛起。因此，现代作家和进步文人极力强调推广文字，普及教育，扫除文盲，启蒙拯救。目的在于让每一个农牧民都获得掌握文字的基本能力，获得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从而达到民族强盛。1935年出版的现代杂志《漠声》发表色仍的《现在应加速我内蒙古的教育》一文。作者认为，“教育发达与否，是决定任何国家或民族强弱的根本原因。故复兴民族应治本，首重教育。要自强，依赖他人的帮助是靠不住的。他人之所以给我们好处，是他们自己要得到好处，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便不会帮助我们。这一点早为以往和现在的事实所证明。”^[32]在这种情况下，文人精英们的思路发生转变，从以前的经典文章逐步转移到大众文学的通俗化道路。克兴额说：“文化密切关系到民族的兴衰。”^[33]阿拉巴金也提出：“文化与民众生活及其历史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34]赛春嘎更是呼吁“请动用挥洒文艺的神笔吧！”^[35]文学作品全面迎合了民众的教育文化需要和社会生活需求，并始终坚持以民族、民众和民生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的社会变迁。”^[36]虽说，现代时期并不等于现代化社会发展时期，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可以认为现代时期是现代化过程的早期阶段或酝酿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内发生了局部的“内在的社会变迁。”现代蒙古族作家既是这种“内在的社会变迁”现象的艺术再现者；又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观念与教育层面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是一个逐渐自觉的实践意识。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对人的现代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什么是现代人、促成个人现代化的因素与环境、个人现代化的过程及未来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并认为，“个人的现代性是一个多种性质的综合体。”^[37]虽说蒙古族现代文学与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和汉族现代文学概念框架有所不同，但是在时间观念和发展理念、传媒出版和作家文学、启蒙思想和文学教育以及理性化、民族化、多样化与人性化趋势上都具备一定意义的普遍性现代特征。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特点，因此许多知识精英都扮演着既是作家，又是文化工作者的多重社会活动家角色。“从现代社会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构了传统本身。”^[38]更为重要的是，蒙古族现代作家里有多位受过国外现代教育，所以与传统的尹湛纳希、丹金旺吉拉等老作家相比，无论在现代文学思想意识上，还是在社会组织活动能量上均超过近代文人作家，具备了能够进行现代启蒙文化教育的实力。蒙古族现代文学作品实际上变成了作家社会行动理念的现代传播载体，在现代社会启蒙教育和民族拯救运动中发挥了时代的先锋作用。

参考文献

[1]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 (Danilo Martuccelli) 著，姜志辉译. 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 [M].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

[2] 内蒙古图书馆. 内蒙国民旬刊 [M]. 第一卷, 蒙古文版. 第 1 页.

- [3] [日]内田孝,「新モンゴル」誌第二号とモンゴル人留学生による文芸活動, 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 北東アジア研究第 14、15 合併号, 2008. 239.
- [4] 白润生. 现当代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业发展情况[J]. 当代传播, 2004, (4): 14.
- [5] 额尔都木图, 宝音套格陶夫编著. 布和贺西格及其蒙文学会[M]. 蒙古文版,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3. 249.
- [6] 阿拉腾敖其尔译. 圣祖成吉思汗战争史[M]. 序言, 蒙古文版,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第 1 页.
- [7] 那古单夫, 那林高夫. 特睦格图传[M]. 蒙古文版,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143~145.
- [8] 那古单夫, 那林高夫. 特睦格图传[M]. 蒙古文版, 赤峰: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345.
- [9] 纳·赛音朝克图全集[M]. 第五卷,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337.
- [10] 乌·苏格尔、特·德力根仓编著. 古代和现代蒙古族作[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385.
- [11] 纳·赛音朝克图全集[M]. 第五卷,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340.
- [12] 纳·赛音朝克图全集[M]. 第五卷,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341.
- [13] 纳·赛音朝克图全集[M]. 第六卷,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353.
- [14] 巴·布林贝赫. 蒙古诗歌美学论纲[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137.
- [15] 蒙文大同报[M]. 蒙古文版, 北京: 1913. 32.
- [16] 仁钦戈瓦编著. 蒙古文化史试拣[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396.
- [17] 荣霖森总编. 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M].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市民族事物委员会编辑出版, 2006. 192.
- [18] 蒙文分类词典[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78. 37~38.
- [19] 毛星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M]. 中,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142.
- [20] 苏都毕力格贵编. 蒙古族近代诗歌选[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0. 272.
- [21] 李洵等著. 中国少数民族古代近代作家文学概论[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 122.
- [22] 巴·格日勒图集注. 异草集(1931-1945 年蒙古文学作品选)[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191.
- [23] 孟和乌力吉著. 蒙古文文论理论建构(1900~1949)[M]. 蒙古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678.
- [24] 巴·格日勒图著. 蒙古文论历史研究[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8. 329.
- [25] 颜敏. 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想象”设定的问题及其解决[J]. 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55.
- [26] 朱光潜著. 文艺心理学[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26.
- [27] 李丕显. 论自然和人的二重化[A]. 蒋孔阳主编. 美学与艺术评论(二)[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65.
- [28] 巴·格日勒图集注. 异草集(1931-1945 年蒙古文学作品选)[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191. 337.
- [29] 额尔敦道格套编. 蒙古族教育资料集[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83. 39~40.

- [30] 额尔都木图, 宝音套格陶夫编著. 布和贺西格及其蒙文学[M]. 蒙古文版,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3. 286.
- [31] 苏尤格主编. 蒙古族文学史[M]. 现代, 蒙古文版,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0. 333.
- [32] 云子明总编. 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M]. 总第 3-4 期, 呼和浩特市民族事物委员会编辑出版, 2003. 6.
- [33] 巴·苏和著. 蒙古文学发展史导论[M]. 蒙古文版,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32.
- [34] 桑宝, 呼春编. 赛春嘎[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7. 370.
- [35] 巴·格日勒图著. 蒙古文论历史研究[M]. 蒙古文版,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8. 350.
- [36] [美] 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等译. 社会学[M]. 第十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34.
- [37] 贾春增主编. 外国社会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379.
- [38]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为社会学辩护[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

The modernity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Mongholji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e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includes all written and oral literary forms of Mongolians ranging from about 1900 to 1947.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s and some part of it has universal modernity. The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ngolian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forms its own unique development rules. Based on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with the methods used in cultural sociology and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studying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modes of literature, modernity of the trend of thought in literature and art, modernity of literary creation ideas, modernity of image-shaping and modernity of social effect,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zes and reflects on why the modernity in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is formed and wha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t has.

Key word: The modern Mongolian literature ; modernity;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13-04-08;

作者简介: 孟和乌力吉 (1972-), 男,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生态人类学、沙地与湖泊环境问题、环境文化与环境意识、蒙古族居住环境与祝赞词等方面的研究。